

李敖作品精选 第2辑

• 李敖 著

西餐叉子吃人肉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敖作品精选第2辑

• 李敖 著

西餐叉子
吃人肉

中国华侨出版社

6ay43104

(京) 新登字 190 号

李敖作品精选第 2 撷
西餐叉子吃人肉
〔台湾〕李敖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150 千字 9 印张
版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7-80074-506-6/I · 282
定 价 (全四辑): 23.20 元
本 辑: 5.80 元

目 录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1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8
西餐叉子吃人肉	44
“显性伪君子” 和 “隐性伪君子”	48
惨刑与迫害	52
祖法和历法	70
莎士比亚是特务	74
怎样教洋鬼子	77
中华大赌特赌史	82
师道与是非	94
捺钵文化和比较.....	107
旧天子与新皇帝.....	111
宋帝始生异象考.....	119
“两昆仑” 考	126
论袁世凯（二篇）	131
避祸学大纲.....	137
乱世父女泪.....	141

一种失传了的议论道具	146
佞佛·毁佛·欢喜佛	152
新印“厚黑教主传”述源	162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导引	165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168
胡适之不怕老婆考	172
家族——人越多越好	178
音乐——华夷交响乐	187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197
新闻——报纸像杂志	206
传令——全国大跑马	216
征兆——来头可不小	225
避讳——“非常不敢说”	234
直笔——“乱臣贼子惧”	243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252
人能感动蝙蝠论	262
人能感动老虎论	268
从高玉树为儿子“冥婚”看中国两面文化	272
“文化太保谈”梅毒	277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做浅盏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

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text{知识分子} + \text{威权者} = \begin{cases} \text{成则为王} \\ \text{败则为寇} \end{cases}$$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这一病态的原因，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尝试所得，原因可有五点：

一、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

.....

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二、急于用世

上面的谋生问题，有些知识分子幸能解决，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怀才不遇”“不甘寂寞”的问题。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

“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三、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昧“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情（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Chauvinist)和家族的忠仆！

四、淆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缭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

五、疏于自省

上面这一病症，归根结底，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疏于自省而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

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很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巴巴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

以上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五种病，立论都从起码着眼，低调着眼。并不以高调苛求。例如并没要求“威武不能屈”或“杀身以成仁”之类，就可证明。因为连起码这一点，若都无法修正，无法解决，尽唱高调，结果也只是高调而已。

知我者晓波，是个认真思考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想用知识来为中国前途求得答案，并以行动来印证这一答案。他的抱负是令人关切的。在我上面指出的这些病里，我不知道晓波的努力能够修正多少，解决多少？但我希望我不是扫他兴的人。晓波出书要我给他写序，以我跟他的交情，我不能写“可以抒情怀”一类的序，因为晓波探讨的问题太严肃了，严肃得使我不得不静下心来，仔细察看一下晓波写作的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信心一问题，而粗浅的写出一点意见。晓波向以“时代透视力”自

豪，这次竟被我透视了一下子，想来也许不服。不过晓波的不服一点不值得担忧，三杯老米酒一下肚，他就软化了。千言万语摆不平他，三杯黄汤就可叫他肝脑涂地。可见制什么知识分子，实在也无须什么知识。

一九七〇、五、十，夜五时

(附记)

这是我代丁颖为王晓波《象牙塔外》写的序。
《象牙塔外》一九七〇年七月由丁颖的蓝灯出版社
出版。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十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想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

余阴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被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作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止他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纭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1.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喇喀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房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2.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学者若能综二千年相承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十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十二）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箫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3.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
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
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髀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话来比近代